

四庫全書所表現的傳統文化特色考探

吳哲夫

國立故宮博物院

〔內容提要〕：四庫全書是一部以叢書體裁表示出修纂當時，中國知識界所認知的文化整體，具有高度的文化價值，甚受世人矚目。前賢爲文討論四庫全書，多偏重於文獻史料方面，本文則試從文化發展史的角度着眼。先分析是部叢書所以能代表我國傳統文化的理由所在，再從其編輯體例及收集的實況，剖析其所表現的種種傳統文化特色，最後提出四庫館臣修書的態度，完全在不背離優良文化傳統原則下，以儒家常理常道爲基礎，既充分發揮了尊重學術流派，兼顧中國境內全體族群的文明，又重視外來新知的取用，以求暢通文化生命。四庫全書在維護傳統及開放融攝的精神下，正足以反映我傳統文化延續與光大的主因，並成爲從事文化工作者承先啟後、繼往開來的典範。

一、前言

文化的起源與發展，深受地理環境及族群社會背景的影響，因此各地區或族群所成就的文化，難免互有差異，而各具特色，並構成所謂的傳統。文化的發展非單一並進，而是多元化的，內涵極爲廣泛，本來就很難用某種具體實物做爲其表徵，對一個有長久歷史，又有濃厚文化基礎的族群，其所開拓的文化成果及特色，自然就更難用特定事務來加以表現。不過，文明的發展，通常藉文字的記錄來傳播與感通，所以書籍一向被視爲文化生命的代表及文明成就的徵象，傳存於後世的大量古代圖書，不但是人們追溯文化源流的依據，也是古今文化接力的主要媒介，更是探索族群文化特色的重要憑証。

中國文化，是指生活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的族群，長久以來所締造的文明成果，要瞭解中國傳統文化的特色，必然需要借

重於所傳存的大批典籍。任何人都不能否認，一部著作所表現的文化層面雖然有限，但如果客觀又公正的聚合各學術門類的著作於一堂，則文化的真象，勢必就容易加以掌握。四庫全書收錄中國古代重要典籍於一堂，不但對所收錄的每一種往著保存全文，更以系統的分類法將歷代學術著作，部勒得井井有序，可以說是一部以叢書體裁表示出修纂當時中國知識界所認知的文化整體，用之來尋找中國傳統文化特徵，應可得到較客觀而公正的答案。

二、四庫全書文化代表性的問題

中國文化博厚悠久，確實難用特定文物來做較完整的表現，本文之所以引四庫全書為例，以之做為探索傳統中國文化所具有的一些特徵，其理由是該全書不僅學術容量廣泛，學術門類又周全；且其採錄圖書層面，廣及全國各地之重要收藏，在採樣上具有一定的宏觀，不至於有孤陋狹隘的弊病；而當日與修人員之普用，又顧及到時代學界權威的代表性。四庫全書在人才濟濟與圖書資料齊備的雙軌運作下，對傳統中國文化所做的一番總結，自然容易把握住傳統文化的真貌，茲再將上述各項理由，分別說明如下，

1. 與修者多為學界一時菁英

我國是一個極重視文明開展的國家，所以傳世的歷代典籍最是豐富。四庫全書欲從浩如煙海的群籍中，摘精選華，做為古來全部文化的總結與表徵，必須有淵博學識又具弘觀遠見的人士與修，方克成事。綜觀當時參與修纂四庫全書的人員，約可類分為主持、與修及執行勞務工作等三個層次。主持者，指敕令修書，又身居幕後操控，對選錄圖書有絕對影響力的人，便是清高宗；與修者是指承主持者之命，負責甄選圖書，規劃學術門類，部次群籍，又監督修書之一切工作的人，即是四庫館的館臣；至於執行勞務工作者，包括派赴各地蒐訪圖書、謄錄文字、裝潢書冊、製做書函等執行主持者及與修者所交辦事項的人。以上人物，除執行勞務工作者外，前二者均負籌劃與選書等重責大任，直接影響到四庫全書的成敗，故當日參與修纂的清高宗並四庫館臣，其學養是否豐厚，至關重大。

(1) 博學多能的清高宗

我國歷代官修大書，無論規模或成就，均以四庫全書為第一，這和敕令修書的清高宗個人學養，有絕對的關係。清高宗雖是入關的滿洲皇帝，但其即位在清室入主中原接近百年之際，當時清室早已澈底漢化。清高宗從小就接受嚴格的中國傳統文化教育，他曾在「樂善堂文集」中自述：

少有餘閒，未嘗不考鏡經史，以自觀省。【註一】

又說：

余生九年始讀書，十有四歲，學屬文，今年二十矣，其間朝夕從事者，「四書」、「五經」、「性理綱目」，「大學衍義」、「古文淵鑑」等書。【註二】

乾隆二年（一七三七）三月戊申，清高宗也曾說：

自承大統，劫毖萬幾，少有餘閒，未嘗不稽經讀禮。【註三】

少年勵學，即位後又不曾遠離書本，奠下清高宗豐富的學識基礎。另據清雍正間保和殿大學士張廷玉說：

皇四子（日後的清高宗）粹質天稟，明敏博達。【註四】

先天聰敏，後天又勤學，可謂得天獨厚。所以清高宗一生所撰詩四萬餘首，文有千數百篇，其詩文集達五百七十六卷【註五】為歷來帝王所遠不及。乾隆間戶部侍郎于敏中所稱：「皇上濬哲天成，緝熙時懋，每當幾餘勤政之暇，尤著立言載道之功。」【註六】所言並非虛假。

清高宗在位久，積豐富學驗於一身，深悉悠久、博厚、高明的道理，他曾說：

天地之德不可見，而見於博厚高明。聖人之德不可見，而見於悠久。惟悠久故積累之至而為博厚，發越之極而為高明。

【註七】

道之大原出於天，其傳在聖賢，歷代聖哲英傑的著述，是悠久、高明的像徵，也是文化所寄存。清高宗之所以敕命修纂四庫全書，創空前未有之文化鉅製，自與其學驗俱豐有密切關係，而他表現在修纂的過程上，更是親身的參與，這又和他喜好翰墨有關。據「四庫全書總目」凡例說：

是書卷帙浩博，爲亙古所無，然每進一編，必經親覽，宏綱巨目，悉稟天裁。又說：

前代藏書，率無簡擇，蕭蘭竝擷，珉玉雜陳，殊未協別裁之義。今詔求古籍，特創新規，一一辦厥妍媸，嚴爲去取。其上者，悉登編錄，罔致遺珠，其次者，亦長短兼臚，見瑕瑜之不掩。【註八】

「嚴爲去取」的甄選群書，均需仰賴「天裁」的同意。清高宗直接參與，其學養自然影響到全書的品質，而前述清高宗的博學多能，正是全書在選錄圖書上成功的要件之一種。

(2) 聚合學界菁英的四庫館

四庫全書修纂的主要目的，在對清乾隆朝以前的歷代典籍進行系統的整理，做出全面性的總結，以方便學人利用。這樣大的文化工程，參與修纂者如果對浩瀚的古代學術不夠擅長，必無法成就其事。所以博學的清高宗於開四庫後特別注重館中人才的選拔。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三月十一日四庫全書館所擬辦章程中之第三則建議：

四庫全書，集藝苑之大成。……臣等共同酌議，查現在纂修翰林紀昀，提調司員陸錫熊堪膺總辦之任。此外並查有郎中姚鼐，主事程晉芳、任大椿，學政汪如藻，原任學士降調候補之翁方綱，亦皆留心典籍，見聞頗廣，應請添派爲纂修官，令其在館一同校閱，悉心考核，方足敷用。又查有進士余集、邵晉涵、周永年，舉人戴震、楊昌霖，于古書原委亦多能認識，應請旨行文，調取來京，在分校上行走，更足資集思廣益之用。【註九】

清高宗隨即同意，並下令調用專才：

前據辦理四庫全書總裁奏，請將進士邵晉涵、周永年、余集，舉人戴震、楊昌霖調取來京，同司校勘。業經降旨允行，但念伊等現在尚無職任，自當予以登進之途，以示鼓勵。【註十】

修纂大書必然需要各方面人才，以上所舉，只是其中之一例而已。其實修書當日，選拔人才，除了指派、徵召之外，更從館臣之推荐，或採自願請求參與等多管道進行。由於晉用人才管道極廣，許多內廷或外地的專家學者，都列職四庫館中，共襄修書大業。如戴東原、翁方綱、莊存與、王念孫、任大椿、朱筠等爲經學大家；謝墉、任大椿等則專精小學；陸錫熊、邵晉涵

、彭元瑞等爲知名的史學家；李潢、陳際新具算學之專長；姚鼐、紀昀、朱瑞、曾燠等之擅長文學，都是顯例。各學術門類人才濟濟，自然對全書的佈局，能予周詳籌劃，而甄選的各門類圖書，必也能做到較客觀又公正的選擇。四庫全書所代表的傳統文化知識幅度，在成書之後，受到後世普遍的讚賞，當日四庫館中人才齊備，又是要件之一樁。

2. 利用藏書廣及全國

要對前代文化成果做總結，又要能客觀公正的彰顯傳統文化的全面特徵，如果利用的圖書層面不足，更容易落入識陋狹隘的弊病。所以四庫全書修纂之時，清內府雖然已有相當豐富的書藏，猶不以之爲滿足，故在修書初始，清高宗發起歷史上最大的訪書運動。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七二）正月四日諭令：

朕稽古右文，聿資治理，幾餘典學，日有孜孜。因思策府縹緲，載籍極博，其鉅者羽翼經訓，垂範方來，固足稱千秋法鑑，即識小之徒，專門撰述，細及名物象數，兼綜條貫，各自成家，亦莫不有所發明，可爲游藝養心之一助。……今內府藏書，插架不爲不富，然古今來著作之手，無慮數千百家，或逸在名山，未登柱史，正宜及時採集，彙送京師，以彰千古同文之盛。〔註十一〕

爲貫徹搜訪成效，舉凡收購、借抄、獎勵獻書等手段都運用上。同時爲避免收到重複書，更規定「各承辦之督撫學政等，得先將訪得之圖書，仔細鑑別，門列簡明摘要書單呈進，俟廷臣檢覆後，有堪採集者，再開單行知取進。」〔註十二〕除此之外，在修書進行的長久時期裡，訪書從未間斷，並嚴格要求各省督撫發動僚屬，廣肆搜訪，如有「因循搪塞，惟該督撫是問。」〔註十三〕此外，對已佚散的圖書，則令儒臣等從「永樂大典」輯出。上述清高宗大規模的徵書舉動，固然也有清室的其他目的，然而修纂四庫全書時，館中已掌握了前所未有的學術資源，是不爭的事實。四庫甄選圖書，能廣被全國，從衆群書中取精用宏，對傳統文化的表徵，更增添了一份公信力。

3. 收書體例顧及各門類學術之完整性

文化是人類生活經驗的總合，涵蓋面必然廣泛。中國文化的久遠與博大，長久發展而出的學術門類，亦極爲弘博。漢代以降，各公私藏書處所爲方便書藏的保管及利用，乃對圖書發展出一套編目的學問，將內容性質相近的圖書分門別類。古代

各家分類法雖有所差異，但以經史子集四部法則為主流，故清高宗說：

古今數千年，宇宙數萬里，其間所有之書雖夥，都不出四庫之目。【註十四】

古代所有的圖書，既都不出四庫的範圍，所以四庫全書對圖書的部次，採用四部法，更用四庫為書名，以表示既有所傳承，也顯現全書的周全完備性，故四庫館臣於卷首凡例中明示：

文章流別，歷代增新，古來有是一家，即應立是一類，作者有是一體，即應備是一格，斯協於全書之名。【註十五】

所謂「有是一家，即應立是一類」確實說明四庫全書對學術門類周全性的顧慮。然而古代傳存的各門類圖書繁雜龐多，各書品質亦有高下，如果全加收錄，既不可能，也沒有必要，所以四庫館臣採「擇其醇備」的方式，做為編纂的原則，並在凡例中交待：

今詔求古籍，特創新規，一一辨厥妍媸，嚴為去取。其上者，悉為編錄，罔致遺珠；其次者，亦長短兼臚，見瑕瑜之不掩。【註十六】

為保持各學術門類的水準，對歷代珉玉雜陳的圖書，做「嚴為去取」的甄選工夫，使四庫全書確實做到「綜群書之淵海，廣四庫之儲藏。」進而能表現特有的文化傳統，四庫館臣之不排除各門類學術，是相當重要的因素。

三、四庫全書所具傳統文化特色詳實

前述四庫館中人才齊備，又充分掌握豐富圖書資源，加上修纂時顧慮到傳統學術門類的周全，在各項條件齊備下，所審慎甄選出的代表性圖書，經過系統部次而成為一部以叢書為體的四庫全書鉅製，可以說是相當成功的將我國古代整體傳統文化加以濃縮，從其縮影中，不難窺見中國傳統文化特殊徵象的輪廓，茲就探索所得，分述於下。

1. 以儒家為傳統文化的重心

中國先秦以前，雖然百家爭鳴，但以儒墨道三家為最顯著，其後墨家精華為儒道兩家吸收，我國文化乃由黃老、孔孟兩大水源而匯合成中國的一個文化大源。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行」後，儒家遂獨自壯大，成為中國文化的主流。清室入

主中原前後，漢化極深，因此在文化表現上，也以儒家文化爲正統，以清初三次訪求圖書均偏重於儒家典籍的搜求爲例，即可印証。康熙二十五年（一六八六）閏四月七日康熙帝訪書令說：

今搜訪藏書善本，惟以經學史乘，實有關係修齊治平，助成德化者，方爲有用，其他異端說，概不准收錄。〔註十七〕乾隆六年（一七四一）正月四日頒訪書詔令曰：

但近世以來，著述日繁，如元明諸賢，以及國朝儒學，研究六經，闡明性理，潛心正學，醇粹無疵者，當不乏其人。雖業在名山，而未登天府，著直省督撫學政，留心採訪，不拘刻本鈔本，隨時進呈，以廣石渠天祿之儲。〔註十八〕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四日訪書令中也說：

除坊肆所售舉業時文，及民間無用之族譜、尺牘、屏幃、壽言等類，又其人本無實學，不過嫁名馳騁，編刻酬倡詩文，瑣屑無當者，均無庸採取外，其歷代流傳舊書內，有闡明性學治法，關係世道人心者，自當首先購覓。至若發揮傳注，考覈典章，旁暨九流百家之言，有裨實用者，亦應備爲甄擇。〔註十九〕

不僅訪書偏重在「研究六經，闡明性理，潛心正學」的儒家經籍，四庫全書所著錄圖書，更是以儒家圖籍做爲核心與基礎。因此有人認爲清高宗所以修纂四庫全書，係受明曹學佺倡仿佛、道藏方式，集合儒書於一堂，以及清周永年儒藏說的啟示。任松如四庫全書答問即說：

編纂四庫全書，就表面言，有三大原因，周永年先唱儒藏說，指集合儒書，與釋藏、道藏，鼎足而三，一因也。〔註二〇〕

清高宗在「文淵閣題記」亦指出：

禮樂之興，必藉崇儒重道，以會其條貫。儒與道，匪文莫闡，故予蒐四庫之書，非徒博右文之名，蓋如張子所云：「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胥於是乎繫。〔註二十一〕

確實說明編纂四庫全書的目的，在崇儒重道，所以四庫館臣在凡例中特別說明：

今所採錄，惟離經畔道，顛倒是非者，培擊必嚴，懷詐挾私，熒惑視聽者，屏斥必力，至於闡明學術，各顯所長，品驚

文章不名一格，兼收並蓄，如渤海之納衆流，庶不乖全書之目。【註二十二】在這樣的編輯體例下，凡離經叛道的圖書，都不在收錄之內。雖然四庫全書，有「如渤海之納衆流」，也著錄九流、釋道等書，但規定極嚴，凡例中說：

九流自「七略」以來即已著錄，然方技家遞相增益，篇帙日繁，往往僞妄荒唐，不可究詰，抑或卑瑣微末，不足編摩，今但就四庫所儲，擇其稍古而近理者，各存數種以見彼法之梗概，其所未備，不復搜求。蓋聖朝編錄遺文，以闡聖學明王道爲主，不以百氏雜學爲重也。

又說：

文章流別，歷代增新，古來有是一家，即應立是十類，作者有是一體，即應備是一格，斯協於全書之名。故釋道外教，詞曲末技，咸登簡牘，不廢蒐羅，然二氏之書，必擇其可資考証者，其經懺章咒並凜遵諭旨，一字不收。【註二十三】九流、釋道之書所以不廢蒐羅，用意在聊備一格，也在顧及門類學術的完整性，而所謂「聖朝編錄遺文，以闡聖學明王道爲主」，更說明四庫全書的編纂在以儒家思想爲中心，並以之調合統一其他各家學說。從之亦不難看出中國傳統文化特色是建立在儒家基礎上，又以開放融攝的精神，通權達變，以求日新而又新。

2. 尊重道統，又重視人品

中國人把宇宙事務綜合爲天、地、人三才，而以人爲中心，將天地之道與人事之理串聯。古代所謂本天道以立人道，立人德以全天德，便是儒家思想中直從人生問題打通到宇宙問題的註腳。聖哲英賢是人類成就的標桿，因此被以人爲本位的中國人所特別崇敬。清高宗在「讀書以明理爲先論」文中即說：

道之大原出於天，其用在天下，其傳在聖賢，賴學者講習討論之功，聖賢的嘉言，聖君的善政，都有助於治理。【註二十四】

聖賢、聖君是傳述天道的表徵，我國歷代以來即特別予以尊崇，且代代紹述，綿延不絕，而構成所謂道統。四庫全書承此傳統更倍加重視，清高宗曾頒令四庫館臣在著錄書中，當謄錄聖賢、聖君名諱時，不得直書其名，以示崇敬說：

朕御製詩文內，如周程張朱皆稱爲子而不斥其名，又如韓昌黎、蘇東坡諸人，或有用入詩文者，亦祇稱其號而不名，朕於異代之臣，尚不欲直呼其名，乃千古以下之臣，轉將千古以上之君，稱名不諱，有是理乎？朕命辦理四庫全書，親加披覽，見有不協於理者，如關帝舊諡之類，即降旨隨時釐正，惟準以大中至正之道，爲萬世褒貶。」【註二十五】

清高宗所以指示對歷代聖哲英傑加以崇敬，目的無非要時人及後世子孫，奉以爲法，從師法聖賢的工夫到挺立自己的道德人格及道德人品。事實上，我國自來即有此傳統。也因如此，四庫館臣對歷代著作者之人品是否醇正，成爲甄選圖書考慮的重要因素。這種觀念觀屢見於清高宗頒示的各次手諭中，例如乾隆四十一年（一七七六）十二月初三日上諭：

如王永吉、龔鼎孳、吳偉業、張縉彥、房可壯、葉初春等，在明已登仕版，又復身事本朝，其人既不足取，其書不當復存，自應概從刪削，蓋崇獎忠節，即所以風節臣節也。【註二十六】

乾隆四十六年（一七八一）十月二十七日上諭：

若楊漣、左光斗、熊廷弼諸人，或折衝疆場，或正色立朝，俱能慷慨建議，剴切敷陳，設明之君，果能採而用之，猶不致敗亡若是之極。其事距今百十餘年，殷鑒不遠，尤當引爲炯戒，則諸人奏疏不可不亟爲輯錄也。【註二十七】

當時總纂官紀昀也標舉出：

明之宋濂、高啟、李東陽、吳寬、王鏊、李夢陽、何景明、徐禎卿、高叔嗣、唐順之、王慎中、歸有光、李攀龍等，均以正派相承，爲一代冠冕，悉宜並存。

又提出：

諸集中端正如張九齡、清介如趙抃、忠直如陸贄、學品純正如司馬光、奉使不辱如赫經，雖其著作本有可取，而文以人重，亟錄之，尤其矜式士林。【註二十八】

所謂人正則筆正，作品內容及思想是否正派，更成爲四庫館臣選錄圖書的重要參考，所以紀氏又說：

人格逸變，僞體日生，凡不軌於正者，悉從刪汰。【註二十九】

四庫全書依持這種原則，所收錄的圖書不少，如范祖禹的《唐鑑》，便是以「議論純正，極爲朱子所推重，故獨取之。」即

是顯例。

中國文化建基於人生修養，是希望人們將自己的心靈精神，化為德，化為功，化為言，惟有如此，人們的生命便能隨著個人所創造的價值而垂於久遠。四庫全書著錄圖書處處表現，崇敬聖賢英傑及重視人品醇正的特點，又是繼承傳統文化的另一表徵。

3. 文化界線深於民族界線

中華民族在世界上繁衍成最多的人口，也據有極廣闊的土地，應與其文化有深切的關係。在中國人的觀念裡，是沒有很深的民族界線的，他們看重文化遠甚於看重血統，也就是說只比較重視文化的高低，不太留意血統的異同。遠在秦漢時代的中國，如果用民族來分析，至少有華夏系、東夷系、荆蠻系，百越系，三苗系……等血統上的差別。中國當時的祖先，尤其是為之主幹的華夏諸系，都能抱著寬大的民族觀念，不以血統而以文化來互相包融。所謂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狄進於中國則中國之，此是中國人不以狹隘的血統界線自封自限，而以文化來分別的明証。清以滿洲人入主中原，其在入關前及入關後，漢化之深，為歷史上各漢外族系所少見。清高宗於乾隆三十年（一七六五）元月召見駐劄伊犁的將領伊勒圖時，發現其清語較前生疏曾指責說：「乃伊勒圖清語，轉不如前，想來伊犁大員皆說漢語，全不以清語為事。」就是顯例。滿人樂於放棄自己的語言而從漢語，固然因為文化上處於絕對弱勢，所無可奈何之事，但從之可見「文化力量」的偉大。清雍正皇帝曾在雍正七年敕令刊行《大義覺迷錄》一書，其於卷首上論中說：

蓋生民之道，惟有德者可為天下君……又豈因何地之人而有所區別乎？……不知本朝之為滿洲，猶中國之有籍貫。〔註三十〕

雖說這是清朝皇帝，圖以巧辯立說來蠱惑人心，以達到統治中原的目的，但時至今日，提倡五族共和的時代，「豈因何地之人而有所區別乎？」的觀念已非全無道理。四庫全書修纂的幕後主持者是滿洲皇帝，而編纂館臣絕大多數為漢儒，且所收典籍並不離崇儒重道的原則，清高宗又特別強調：

禮樂之興，必藉崇儒重道，以會其條貫。儒與道，匪文莫闡，故予蒐四庫之書，非徒博右文之名，蓋如張子所云：為天

地立心，爲生民立道，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胥於是乎擊。〔註三十一〕

一位非漢族的國君，能體認文化的重要，能拋棄自己的語言文字，認同國境內高度文明發展的文化，豈不是已證明傳統「血緣的界線，遠不如文化界線重要的觀念」？而四庫全書著錄的圖書中，並非全爲漢籍，也點輟一些中國境內其他民族學者的著作，如：

滿人

納蘭性德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

圖理琛 〔異域錄〕

蒙人

托克托 〔宋史〕

〔金史〕

〔遼史〕

納新 〔河朔訪古記〕

寶巴 〔易源奧義〕

〔周易原旨〕

小撒辰薩囊台吉 〔蒙古源流〕

新疆人

瑪哈穆特 〔七政推步〕（原著名：回回曆）

瑪沙伊赫 〔七政推步〕（譯本）

瞻思 〔河防通議〕

此外，又有一些譯本，如由別種文字譯成漢文的：遼、金、元三史地名、人名、官名及〔三史國語解〕是由滿文譯出；〔唐

四庫全書所表現的傳統文化特色考探

開元占經」是由西域「九執曆」譯出；「七政推步」譯自西域默德納國王瑪哈穆特之「回回曆」。而由漢文譯成其他文字的則有：譯成滿文的「五經」及「四書」。雖然四庫全書著錄中國境內其他民族的作品所佔的比例甚低，這是因為文化上強弱勢對比的關係，而四庫全書修纂時能不予排斥，略予以收錄，實已充分顯示中國人重視文化認同的優良傳統特點。茲再提出，四庫全書中還著錄了幾部我國境內重要文字圖的例子：

〔增訂清文鑑〕 滿文、漢文對照。

〔滿洲蒙古漢字三合切音清文鑑〕 滿文、蒙文、漢文對照。

〔同文韻統〕 藏文、梵文、滿文、漢文對照。

〔西域同文志〕 滿文、漢文、蒙文、藏文、回文、托忒文對照。

這些書籍主要的功用，在做通譯的工具，透過這些字書，各族群更能夠增進彼此的瞭解，進而相互學習，增加民族情感，而民族的融合，也就比較容易在無形中進行。其實清高宗除精通漢、滿文字之外，甚為注意其他重要文字的學習。他曾說：

且厄魯特語及回語，朕亦因暇而習焉，時御丹槩為之改正，是「西域志」之書，必應及時成之，用開歷代之群疑，垂千秋之信錄。〔註三十二〕

皇上的重視，四庫館臣必然曲意迎合。事實上對中國境內各民族語言文字的重視，並不始於清朝，遠者有成周時代象胥之官，近者明代更有「華夷譯語」、「高昌譯語」、「十國譯語」等書，足見中國境內各族群間的構通，是早就存在的一種文化事實，而四庫不但承襲此一傳統，且於收錄此等書籍時，為求精確與品質，與修人均從各民族人民中遴選。以「西域同文志」為例，除漢人外，七德、文溥等為滿人，巴達爾瑚等為蒙古人，巴爾藏佳穆定、伊史益楚克等為西藏喇嘛，爾西冊等則為新疆人。〔註三十三〕多種族人氏參與修書，是四庫全書的另一種特色，而其能以文化弘觀的角度，並收境內各族群的重要著作，更是傳承優良中國文化傳統的又一事實表現。

4. 從古又開新，暢通文化生命

我國自晉代創圖書四部分類法而為「隋書經籍志」所採用後，四部分類方法，遂長期固定。玄宗開元九年（七二一

「將整理完竣的四部書，分別入藏四個書庫，「四庫書」之名，就從此濫觴。清高宗敕令修書也採四部分類法來編排部次群書，且將之命名為「四庫全書」，可以說是對前代的整理圖書既表示了承襲「四庫」，又表示要發展得更為周「全」。所以此一部大叢書，一方面要繼承前代，卻又要有所發展，正符合我中華文化素來即能在保存優良傳統下，更能加以創新推進，以使文化生命更茁壯更光輝。」

文化的發展有如成長茁壯的大樹，必需根實葉茂，才能生生不息，燦爛完美。傳統的中華文化之悠久博大，雖是根實的表現，但尚有待風日吹晒，雨水滋潤，才能更成長而生生不息。四庫全書的「全」字，正是適度風日雨水的表現，故其於崇儒重經之外，又求百科具備，以透過通達權變的精神，既做古又創新的態度來編纂。茲以部次圖書的方式為例，在薈要凡例中說：

分門別類，如歷代史志，鄭樵「通志略」、「崇文總目」、晁公武「讀書志」、陳振孫「書錄解題」、馬端臨「文獻通考」、焦竑「經籍志」及諸家編目各有不同，或間相糾正，今悉為參考，擇其區別精當者從之，未敢泥於一家之說也。

【註三十四】

對前代編目法則於擇善而從外，貴能不泥於古人之說，對前人分類不妥當的書，一一詳審其內容，再歸入適當的門類，所以凡例又舉例說：

古來諸家著錄，往往循名失實，配隸乖宜……如「筆陣圖」舊入小學類，今惟以論六書者入小學，其論八法者，不過筆札之工，則改隸藝術。「羯鼓錄」之屬，舊入樂類，今惟以論律呂者入樂，其論管弦工尺者，不過世俗之音，亦改隸藝術……「孝經集靈」舊入孝經類，「穆天子傳」舊入起居注類，「山海經」、「十洲記」舊入地理類，「漢武帝傳」、「飛燕傳」舊入傳記類，今以其或涉荒誕，或涉鄙猥，均改隸小說……凡斯之流，不可殫述，並一一考核，務使不失其真。

師法古人之長處，又能改正古人不是之處，故梁任公稱贊道：「其（指四庫全書總目之分類法）述作義例之周備實已為崇文總目以下所莫能逮。」【註三十五】從古開新，不抱殘守缺的精神，是館臣光大文化生命的重要手段。

此外，文化不固步自封，文明才能愈見壯大，所以古來即有，雖小道必有可觀，而芻蕘狂夫之言，也不加廢黜的傳統觀念。我國文明雖誕生早，發展快速，但從來即不排斥外來知識，例如魏晉南北朝時代，王儉的《七志》、阮孝緒的《七錄》均著錄佛經釋籍，而《隋書經籍志》也載錄外來醫書十餘種之多。中國人長久以來與臨邦交往，早對天下之廣闊有所認知，同時為不自限於孤陋寡聞，對外在的世界，自來感到興趣與重視。因此傳統中國知識界不斷的有介紹外在世界風土人情等專書的出現，如劉宋時釋法顯的《佛國記》、唐釋玄奘的《大唐西域記》、宋徐兢的《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元周達觀的《真臘風土記》、明董越的《朝鮮賦》等書，均是其例。四庫全書地理類外記之屬，盡收以上各書外，又增錄多種歐西這類作品，如意大利人艾儒略的《職方外紀》、比利時人南懷仁的《坤輿圖說》等書，更使當時知識界的眼光，擴散到澳、非、美等洲，這是四庫館臣不自限孤陋寡聞的明証之一。

中國以外的世界，當然不止於風土人情而已，各地所發展的文明成果，對人類文化的開拓，必然更有其價值與貢獻，而外在文明成果的訊息，多半藉著彼此來往人士的交流中獲得。以明清為例，西洋有關數學、天文及其他科學方面的圖書，經由東來的傳教士之譯介，才受到當時國人的重視。明神宗萬曆四十一年（一六一三）李之藻在其上「清譯西洋等書」疏中提到「其言天文曆數，有我國中國昔賢所未及者」，而創議「還方文獻，何嫌並蓄兼收，以昭九域同文之盛。」〔註三十六〕清初之際，聖祖皇帝也重視遠來的歐西文化，而於康熙十二年（一七一三）敕編的《律呂正義續編》中說：

我朝定鼎以來，四海畫入版圖，遠人慕化而來漸多，有西洋波爾都哈兒國人徐日昇者，精於音樂……又有壹大里呀國人德禮格者，亦精律學。

西方人的某些特長，受到了朝廷相當的肯定。清高宗更於乾隆十三年九月十一日頒諭說：

朕閱四譯館所存外裔番字諸書，雖分類音譯名物。朕所識者，西番一種，已不無訛缺，因思象胥鞮譯，職在周官，輶軒問奇，載在漢史。我朝聲教四訖，文軌大同，既有成編，宜廣為搜輯，加之核正。悉準重考西番書例，分別門類，彙為全書。所有西天及西洋各書，於咸安宮就近查辦。其暹羅、百夷、緬甸、八百、回回、高昌等書，著交與該國附近省分之督撫，令其採集補正。此外如海外諸夷，並苗疆等處，有各成書體者，一併訪錄，亦照西番體例，將字音與字義，用

漢文注於本字之下，繕寫進呈，交館校勘，以昭同文盛治。著傳恆、陳大受、那延泰總理其事。

高宗對鄰近邦屬並西洋書的看重，為日後四庫館臣，在編輯四庫全書方針上，有了明確的啟示。所以許多外國人的著作，在修纂全書之時，都在進呈行列之中，如：

〔七經孟子考文補遺〕二〇〇卷 日本山井鼎撰〔物觀補遺〕浙江汪啟淑呈進本

〔高麗史〕二卷 韓國鄭麟趾撰 編修汪如藻進呈本

〔越史略〕三卷 越南佚名撰 山東巡撫採進本

〔坤輿圖說〕二卷 比利時南懷仁撰 內府藏本

〔幾何原本〕六卷 意大利利瑪竇撰 兩江總督採進本

〔新法算書〕一〇〇卷 德國鄧玉函等撰 編修陳昌齊家藏本

同時，四庫全書中也收錄外國人著作，並在凡例中說：

外國人之作，前史罕載，然既歸王化，既屬外臣，不必分疆絕界，故木增（明時雲南麗江土司）、鄭麟趾（高麗人）、

徐敬遠（明高麗人）之屬，亦隨時代編入焉。〔註三十七〕

在「不必分疆絕域」的理念下，四庫全書收錄的外國人著作，計：

經部四種（含存目一種）

史部十種（含存目二種）

子部二十三種（存目十一種，其中著錄意大利人利瑪竇著作之〔測量法義〕、〔測量異同〕、〔公股義〕作一種）

集部一種（存目）〔註三十八〕

所收錄的數量所以有限，實係受到當日時代及環境諸多方面的影響。蓋當時東西文化的交流，才陸續的展開，文化的相互影響，在質及量上都受到限制，且那時代的知識界，尚無法突破牢固的自我文化為中心的觀念，所以四庫全書收錄外國人著作幅度的偏窄，是無可奈何的事，也可以不必過分深責。但其已能正視外在知識的存在，又能加以收錄，已如同〔隋書經籍志〕

之收錄外來醫書一般，瞭解到文化細流匯入的重要，四庫館臣表現與時代俱進的權變選書方式，又是繼承傳統文化另一種的特色。

5. 巨細不遺重視所有學術之成就

文化的研究，應該從廣大與高明處著眼，唯有致廣大才能愈高明，也才能久遠。四庫全書對傳統圖書，廣收博採，彙萃群書，就是著眼在傳統文化的廣大與高明處，所以清高宗自詡四庫全書是一部「綜群書的淵海」的大書。雖然無論四庫全書如何博大，也不足以網羅前古所有圖書，但透過「擇其醇備」的功夫，先將歷代傳存下來所有門類的書籍集中，再予甄精選華，有條理彙萃在一起，則可成為傳統文化的精英書庫。這個書庫各門科精華皆備，自然方便昭久遠，而垂諸萬世。因此，四庫館臣在甄擇圖書上，特別慎重，對歷來傳統圖書，先進行全面性的調查。清高宗在修纂四庫全書之初的訪書運動中即曾提到：

今內府藏書，插架不為不富，然古今來著作之手，無慮數千百家，或逸在名山，未登柱史，正宜及時採集，彙送京師，以彰千古同文之盛。著令直省督撫會同學政等，通飭所屬，加意購訪。【註三十九】

重視於古來著作之手的數千百家作品，足見訪書對象，並無學派的分別。事實上四庫全書修書宗旨雖在尊經崇儒，但對「識小之徒，專門撰述」之作品，則多以能「增廣見聞」，給予收錄。又我國自漢代以降，雖然儒家定於一尊，但從未排斥極富知識性的各家著作，所以歷代簿書，對各門類的書籍，總不廢蒐羅，四庫全書更墨守此一傳統，廣收博取，來求其賅備。清高宗乾隆四十年（一七七五）四月即曾頒諭：

顧四庫之藏，浩如淵海，必權衡有定，去取乃精。昔董仲舒請罷黜百家，專崇孔氏，陶宏景則一事不知，引為深恥。今將廣收博采，而傳注時多曲說，稗官不免誣詞，異學混儒墨之談，偽體濫齊梁之豔，於人心世教，未見有裨。如但墨守

經師，胥鈔語錄，刊除新異，摒斥雕華，則九流之派未疏，七略之名不備，抱殘守匱，亦難語賅通。【註四〇】

在尊經崇儒的衛道觀念外，為求賅通，又為避免抱殘守匱，乃對非儒家方面著作，另闢出一條溪徑。〔四庫總目〕子部總敘中指陳：

群言歧出，不名一類，總爲薈粹，皆可採摭菁英，故次以雜家……夫學者研理於經，可以正天下之是非，徵事於史，可以明古今之成敗，餘皆雜學也。然儒家本六藝之支流，雖其間依草附木，不能免門戶之私，而數大儒明道立言，炳然具在，要可與經史旁參，其餘雖真偽相雜，醇疵互見，然凡能自名一家者，必有一節之足以自立，即其不合於聖人者，存之亦可爲鑒戒。雖有絲麻，無棄管蒯，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在博收而慎取之爾。【註四十一】

「凡自名一家者，既有其可取處」便是對所有名家著作的尊重，也是豁達心襟的表現，並在這種觀念下，定出了編輯全書的方針說：

文章流別，歷代增新，古來有是一家，即應立是一類，作者有是一體，即應備是一格，斯協於全書之名。【註四十二】歷史上諸子百家許多重要著作，傳存久遠，影響極廣，如果四庫全書一味站在崇儒重經的立場上，加以排斥，既有失學術文化發展的事實，也失去對待學術的公允態度，何況諸體不備，如何能稱得上是賅備的大書呢？所以四庫館臣再提出「雖有絲麻，無棄管蒯，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在博收而慎取之。」的觀念，圖藉博收慎取的方式，將歷代以來各學術門派的著作，儘量的加以蒐羅，茲引清錢載《四庫全書薈要聯句》幾則注文爲例：

數術家，言多踳駁，本不足重，惟《京房易傳》，魏伯陽《參同契》，皆分易之一體，且其來最古，故存備一家。

又說：

縱橫家書，多出空言，惟《戰國策》尚有事實，故專錄此一種。

又：

墨者之說，爲儒家所不道，然史志皆列其目，蓋存其書以示戒，使人不誤入其說，今仍存《墨子》、《晏子》：書。【

註四十三】

清高宗雖有「百家近正言方取」詩句的指示，四庫館臣卻另說出「即其不合於聖人者，存之亦可爲鑒戒。」的話，可見爲了求全書的賅備，編纂方式是可以權變的。在權變原則下，「識小之徒，專門撰述」等某些所謂「雜學」的圖書，都被網羅在全書之中，而使四庫全書成爲具有四十四類六十六子屬的一部綜合性文化大書。大家都知道，文化是一大群體人生的一個共

業，其範籌至極廣泛，整理者唯能兼容並蓄，始能博洽貫通，也才不會偏失。四庫全書著錄群書，既不遺古今，也不排拒細流，使古來各門各派學術的著作精華，能有較完整性的保存，這種納百川的精神，是傳統文化所以延續與光大的主因，又是四庫全書一項極富意義的特徵。

四、結論

文化必然有一個傳統。中國人的思想傳統，一面講求「久」與「大」，一面又講求「時」與「中」，在通達權變與適應時代環境的運作下，促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悠久博大。四庫全書的修纂，固然有許多清室特殊的目的參雜其中，但從文化發展史的角度來觀察，一項大規模文化活動的出現，往往有一種文化趨向做為深層的活動力。中國文化進入明清時代的高度成熟，已經隱含著文化整理與總結的大趨向，四庫全書便是這一大趨向化為實踐的產物。四庫全書既在總結傳統文化的軌跡運行下所完成，則必然表現出整體文化所具有的種種特色。前文所述四庫全書的編輯體例與收錄圖書實況中，所呈現的各項文化特徵，不難考見我國傳統文化，是以儒家常理常道的基礎，再輔以一種開放融攝的精神，既尊重學術流派，也關心全體族群，復又重視外來新知，在隨時應變下，才能達成延續與光大的成就。又中國文化貴在以人性為中心，將天地之道與人事之理串聯，道是恒久的，人事雖有更替，猶賴有所傳承。四庫全書所以廣收博採，彙萃群書，目的全在昭久遠，傳示無窮，也就是希望透過其總結文化的成果，使後世瞭解我國傳統文化創造的過程，有如源頭活水，必須讓它永遠充沛與暢流，才能日新又新，不為時代所淘汰。四庫全書成書迄今，評論其是非者固多，然而持平者總認為功大而罪小。昔人所論，多偏重於文獻史料方面的探討，本文再試從傳統文化方面為角度，發現「功大而罪小」的確絲毫不假。梁朝劉勰曾說過：「道象之妙，非言不津，津言之妙，非學不傳。」四庫全書大量保存往著全文，又以系統的分類法部勒其書，提供研究傳統文化者莫大的方便，則其貢獻豈止於「承先啟後」、「繼往開來」所謂的「津言」而已！其所表現的傳統文化特質，更將足以激發文化意識，暢通文化生命，樹立文化理想。

註釋

- 【註一】：清高宗撰 樂善堂全集定本（清乾隆二年武英殿刊本） 清高宗乾隆丁巳序
- 【註二】：同前註 清高宗庚戌年原序
- 【註三】：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台北 華聯出版社 民國五十三年影印） 卷二八六 頁七
- 【註四】：同註一 雍正八年張廷玉序
- 【註五】：參見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民國六十五年 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影印）
- 【註六】：清高宗撰 御製文初集（清乾隆間武英殿刊本）于敏中序
- 【註七】：清高宗撰 御製文二集（清乾隆間武英殿刊本）卷二 頁六
- 【註八】：清紀昀等奉敕撰 四庫全書總目（台北 商務印書館 民國七十二年影印） 卷首 凡例
- 【註九】：陳 垣編 辦理四庫全書檔案（北平 國立北平圖書館 民國二十三年出版） 上冊 頁十
- 【註一〇】：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小方冊上諭檔 乾隆三十八年七月十一日上諭
- 【註一一】：辦理四庫全書檔案 前引書 上冊 頁一
- 【註一二】：吳哲夫撰 四庫全書纂修之研究（台北 國立故宮博物院 民國七十九年出版） 頁二十九
- 【註一三】：辦理四庫全書檔案 前引書 上冊 頁十二
- 【註一四】：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 前引書 卷九六八 頁一四二〇
- 【註一五】：同註八
- 【註一六】：同註八
- 【註一七】：大清聖祖仁皇帝實錄（台北 華聯出版社 民國五十三年影印） 卷一六二 頁一六八六
- 【註一八】：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 前引書 卷一三四 頁二〇〇八
- 【註一九】：同註一
- 【註二〇】：任松如撰 四庫全書箋問（河北 中洲古籍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出版） 問五 頁三
- 【註二一】：清高宗撰 文淵閣記（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清高宗御筆）
- 【註二二】：同註八

四庫全書所表現的傳統文化特色考探

- 【註三三】：同前註
- 【註三四】：清高宗撰 樂善堂文集定本 前引書 卷一 頁三
- 【註三五】：陳垣撰 辦理四庫全書檔案 前引書 上冊 頁五〇
- 【註三六】：同前書 上冊 頁四十二
- 【註三七】：同前書 上冊 頁七十六
- 【註三八】：四庫全書薈要總目（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清乾隆間摘錄堂抄本） 卷首 聯句詩注
- 【註三九】：同前註
- 【註四〇】：清世宗敕撰 大義覺迷錄（清雍正間武英殿刊本） 卷前 上諭
- 【註三一】：同註二一
- 【註三二】：清高宗撰 御製文二集 前引書 卷十二 頁十二
- 【註三三】：吳哲夫撰 四庫全書薈要纂修考（台北 國立故宮博物院 民國六十五年出版） 頁二十五
- 【註三四】：四庫全書薈要總目 前引書 卷首 凡例
- 【註三五】：昌彼得撰 版本目錄學論叢（台北 文史哲出版社 民國六十六年出版） 下冊 頁一一五
- 【註三六】：明徐孚遠等編 皇明經世文編（台北 國聯出版社 民國五十三年影印明崇禎間平露堂刊本） 卷八四三季我存集卷一 第二九冊 頁六五三
- 【註三七】：同註八
- 【註三八】：參考吳哲夫撰 四庫全書收錄外國人作品之探求（收錄在民國八十年第四屆中國域外漢籍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中 聯合報文化基金會國學文獻館編印）
- 【註三九】：同註一一
- 【註四〇】：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 前引書 卷九八一 頁一四三九九
- 【註四一】：四庫全書總目 前引書 卷九十一 第三冊 頁一八〇二
- 【註四二】：同註一五
- 【註四三】：同註二八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China as Represented in the *Ssu-k'u Ch'üan-shu*

Wu Che-fu

National Palace Museum

Abstract

The *Ssu-k'u Ch'üan-shu* signifies a major effort on the part of the Ch'ing intellectual community to embody in a single library of classics the substance of the civilization of China. Released in a serial format, the encyclopedic work is, to be sure, of the highest cultural value, and has been a treasure-trove for the serious students seeking for more knowledge about the Middle Kingdom. When addressing various issues related to the *Ssu-k'u Ch'üan-shu*, scholars of the past had tended to focus exclusively on materials contained therein and documents pertinent to the collection itself. This author, however, has in this article taken a non-bibliographical approach. Specifically, he attempts to assess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ambitious work from a cultural studies perspective. First, an analysis will be given to show how the *Ssu-k'u Ch'üan-shu* is representative of 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China. With the structure of the library and its compilation taken into account, the paper will then proceed to outline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embedded in the *Ssu-k'u Ch'üan-shu*. In conclusion, it is argued that the stance of the scholar-compilers in the *Ssu-k'u* project was firmly rooted in the Confucian lineage, and was in line with China's cultural orthodoxy. With reference to the works selected for inclusion in the library, such an orientation had served to ensure that all schools of thought were duly respected, and that no branch of knowledge, be it domestic or foreign, was neglected. The author is in the opinion that this unprejudiced broad-mindedness is in fact what has made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culture in China a reality, and that the very same spirit is sure to elevate the civilization of China to a new horizon in the years to come.

Keywords: *Ssu-k'u Ch'üan-shu* 四庫全書

Chinese culture 中國文化

Sinology 漢學研究

Classification of four divisions 四部分類法

*The author's summary was translated by Chao-ling Sung.

The Chinese text of this article appears on page 一 though 二〇.